

创新，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

本期关注

成都市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和
全国两会精神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精神
科技创新

创新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需要不断地试错，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以提高成功率和降低成本。
政府要用法律保障公平，用市场促进竞争，用政策避免“内卷”。

创新 政府要做的是依赖与引导市场

深圳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一个以新产业新技术规划落后生产力的过程。如果发展总是一帆风顺的话，就没有人愿意退出。经济“紧”一点，有利于科技和产业的转换及调整，“紧”一点会增强企业加大创新，获得发展机会的动力。创新与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是需要采取措施去推动的。

从大的方向上来看，深圳主要做了三个工作。第一，在足够多的市场主体前提下，形成更加规范、清晰的制度性规则和普遍的行业标准，让尽可能多的企业能够到创新赛道来参与竞争。创新的参与者越多，创新的成功率就越高，同时创新者之间的学习交流就越频繁、越充分。第二，深圳会关注符合本市产业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产业技术发展趋势，政府汇聚创新的技术需求，创造有利于企业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公共政策条件。第三，一项技术要转化为产品、商品，往往会面对“最后一公里”甚至是最后的工艺技术瓶颈，这是从科学走向产业化的死亡谷。深圳通过建立公共研发平台，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工程中心，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产品的良品率。渐渐的，深圳这座过去没有工业基础的城市，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创新能力。

唐杰：我们都知道，创新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需要不断地试错。从1985年开始，深圳从初期的技工贸向大规模工业化转型。到了1995年左右，特区政策普惠化，企业发现，深圳的地贵、劳动力贵、电费，大量“三来一补”的企业利用广深港高速公路开通的便利，从深圳迁移去了东莞。深圳走向了自创品牌的模仿制造时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2000年深圳出现了第二轮产业外迁潮。2010年深圳按照中央和省的要求率先开启了新一轮产业升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2—2015年三年时间，有两万多家企业离开深圳，其中约半数集中在宝安区，所以当年宝安区的压力特别大。但

成都日报：
您提到对于新技术的关注，站在政府的角度，深圳是如何去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呢？

唐杰：从深圳的实践来看，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充分依靠市场，充分信任企业，充分尊重企业家。创新是多层次的，既有顶天立地的高大上，也有铺天盖地的草根创新，科技引领、产品技术创新、市场经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的创新和组织的创新以及生产一线对工艺技术改造的微创新。所以，除了科学家们所做的创新之外，还有更多的创新，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是依靠企业和企业家来实现的。当然，深圳这种以企业为主的创新体系，既有短平快爬梯子、上台阶、见效快的优势，但也有基础不够扎实的劣势。

所以，深圳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基础创新能力的建设。过去，深圳是单从北京“拿知识”，但现在，数据显示，深圳自身的专利合作占比已经超过了50%，开始和北京“换知识”，从模仿者成长为科技知识创造者和国际合作者。
首先，深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经验，就是要提升政府对产业和技术的识别能力，有效地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既有多元化合作攻关，也有背对背后的竞争性创新。此外，政府特别重视为城市、为产业创新创造出更多的知识来源。比如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交易会上，哪家的技术大家围着看，峰会上，哪个企业家的演讲大家都去听？就有可能捕捉到创新的新技术、新方向，形成了新赛道、新优势。

其次，有为的政府在于能够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在识别了正确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深圳就通过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进行引导，降低成本，保持企业竞争处在合理的水平。缺乏竞争，企业就会失去创新的动力，而过度竞争可能会产生内卷，大家“躺平”了。企业和企业家承担着巨大风险，是要盈利的。今年两会上，李强总理说企业家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是对企业创业的精准总结。比如，当年深圳的企业热衷于



访谈嘉宾：唐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教授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与此同时，《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科技政策要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科技创新，成为两会高频词，既折射出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更加重视，也反映了社会对科技创新更加关注、更为期待。

城市是国家的基本单元，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城市应该如何在新一轮技术变革和创新高潮中抓住机遇，提升科技创新竞争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3月15日举行的成都市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大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上，市委提出，要发挥好成都优势，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就必须更好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更好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运用，更好地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此，《理论周刊》专访曾参与深圳创新发展转型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教授，从公共政策如何支持创新增长，让有效市场更有效，让有为政府更有为的角度进行解读。

利，发挥比较优势，即是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我们的科技和创新，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外来技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拥有大量年轻且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同时还能适应高强度、高密集的纪律性生产。很多跨国公司到东南亚，到印度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并不适应上万人甚至十万人这样的生产组织方式。但现在，我们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力成本贵起来了，印度和越南的人口增长很快，人力成本比我们更便宜。所以，我们要拓展新领域、开辟新赛道、培育新动能、建立新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走上创新这条路。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创新能力还不太强，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也进入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现在，中央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一的同时，创新能力也要位于世界前列，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也必然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

我认为，在这个发展动力正在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高品质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创新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了一个创新期，专利开始快速增长，2010年以后，专利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2019—2020年深圳两年累计在世界三大专利局公开的专利4.9万件，占我国主要城市的44.6%，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深圳的土地少，所以科技创新的企业高度浓缩，大量产业集聚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过去十年，在深圳南山科技园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聚集密度仍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对多样性和聚集密度提高表现得十分敏感。聚集使城市知识积累的量成指数型增长，不断推出价格水平快速下降的新产品，市场对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宽容度不断扩大，形成了企业创新、知识创造、市场边界扩大的正循环。

再看开放，以北京为例，它本土的创新比例是15%，与深圳合作的创新占比5%，与美国、日本、韩国的合作占比分别是19%、11%、9%。上海，本土创新占比8%，与京、深合作的创新占比6%，与美国、日本、韩国合作的创新占比分别为21%、9%、6%。再看深圳，本土创新占比近22%，与北京合作的创新占比7%，与美国、日本、韩国合作的创新占比分别为17%、8%、17%。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创新表现出了极强的开放性。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城市要成为创新的核心策源地，就必须实现创新的聚集和开放。

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同等重要，科学家、企业家、高水平的产业工人缺一不可。
超大城市要专注于创新创造，中小城市更注重专业化少品种的规模化生产。

城市要找到自身在国家创新中的定位与特色

知识溢出，把知识蛋糕做大。所以讨论创新，就绕不开分工与合作。在同一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之间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是承担不同的功能，有些城市进入了创新复合的精密高迭代时代，有些城市处在规模化资本密集的阶段，而有些城市仍处在劳动密集型的阶段。在此情况下，城市群会形成按照技术复杂性、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的分工。

我们用长三角作为例子，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不同城市在创新链中的分工。长三角的城市，分工层级比较清晰。首先是科技创新强的城市，比如上海、杭州、南京及合肥；其次，是快速工业化的城市，主要是以苏州、无锡和宁波为代表。第三，是一批新崛起的城市，比如台州、湖州。长三角多层次城市群形成，一方面是历史的原因，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主要在南方，所以南方城市的发展历史就比较长，不同城市之间的优势和功能也就不一样，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强化。另一方面，是长三角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让知识不断积累，知识让城市具备了创新的功能，知识的溢出又产生了不同的分工。城市共享长三角的教育优势、科学优势和产业优势，产业集聚和扩散同时发生。

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的城市间分工还不够清晰明确。珠三角城市化历史还不够长，仍处在强化自身的进程中，城市间还是竞合的状态，区

域的发展也不够平衡。但分工的趋势已经出现了。深圳的工业开始向东莞、珠海、中山、惠州扩散，广州的工业开始向佛山、惠州扩散。广州和深圳腾出来的空间，就被用来做高端的科技创新和研发。

那么，再来看成渝地区，这样的分工也还不够明确。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在成渝地区的占比似乎过高？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把产业分散出去，自己的GDP就损失了。但这个损失是不是真损失呢？一个城市的空间和需求终归是有限的，但十座城市的空间和需求，就明显大了很多。成都作为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可能是以服务 and 商贸为主，周边城市工业化水平提升后就会放大对成都产业和科技服务的需求。此外，超大城市因为聚集了多样性的人才，创新与创造的能力会强，会逐渐走向高端创新性生产。但对于中小城市来说，专业化反而是最重要的，要走规模化生产的道路。在长三角的城市群中，纺织业百分之七八十的份额都集中在一两个县，一个小小的打火机制造就可以支撑一个县级市的发展，在深圳，规模两三个亿到二十亿的中小企业，往往与周边城市的制造企业进行创新与制造的分工合作。周边城市的制造企业依赖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未来成都，乃至成渝地区需不需要做这样的转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成都日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您是如何理解创新的核心地位，为什么创新在国家战略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唐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而创新就是前瞻性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过去四十年，我们的发展曾经主要是依靠人口红

成都日报：
科技创新被认为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在这个领域，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唐杰：中国面临的创新挑战，主要是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去理解创新，研究创新的特性。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创新是具有开放性和聚集性这两个特点的。
我们看国内一线城市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进入全球前十的创新城市，有深圳、香港、广州、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是国家创新体系里的领先者。而其他二三线城市，在全球前100名创新城市群排名仍位于第二、第三梯队，尽管不少城市已经聚集了数量较多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以深圳为例，2000年开始，深圳的经济增长进入

成都日报：在您看来，国内城市的创新目前正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能具体谈一谈不同城市在创新过程中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吗？

唐杰：我认为不同城市的创新各有不同。不同城市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也不一样，创新的来源也不尽相同。我们曾做过一个研究，对比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以及成都这样集中了优秀大学的城市与深圳、苏州、无锡这样大学资源较少的城市在创新领域的不同表现。经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两种城市的创新是两种不同类型。前者是科学创新中心，是基础科学引领，高端科学论文的发表数量特别多；后者是产业创新中心，发明专利多，科学发现相对少，但产业化能力要强一些。走向前沿创新要高度关注前瞻性基础研究，但基础研究要变成产业化，不仅仅需要科学家，还需要无数的工程师和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才能实现。所以，不同城市在创新领域，定位可以不同，承担的使命也不同。最重要的是，在国家创新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优势，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

创新是决定区域增长最根本性的因素，区域差异就是源于创新的差异。一个城市是不可能创造全部知识的，需要和其他城市互动，形成相互的